

柯灵 主编 冯金牛 编选

午夜高楼

——《宇宙风》萃编

民国名刊精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266-1
1436

民 国 名 刊 精 选

午夜高楼

——《宇宙风》萃编

宇宙风

第六十四号



A0909693

柯灵 主编
冯金牛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

民国名刊精选

午夜高楼

——《宇宙风》萃编

柯灵 主编 冯金牛 编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 插页 5 字数 325,000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325-2626-7

G·165 定价:20.30元



前 言

周 劭

出版社要出一套过去有影响的杂志的选本,其中有一本是《宇宙风》半月刊。因为我曾参与《宇宙风》的编辑工作,并且创办人和编辑者至今尚存世的只剩下我一人,来为《宇宙风》选本写一篇前言,介绍它创办的经过及当时文坛的背景,是义不容辞的事。但《宇宙风》创刊于1935年秋,至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终刊,前后达六年之久,在中国期刊史上,除了几家以大书店为背景的如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之外,在旧中国的众多期刊中寿命可说最长,其影响也可说是极为广泛的。所以要写这篇前言,应是一篇“大文章”,不能泛泛从事,须得从各方面谈起,涉及面很广;然而我只能谈谈《宇宙风》创办和发展的全过程,而不能涉及本选本的文章内容,因为我并未与操“选政”。

首先得从中国之有期刊说起。中国之有期刊,自应从现代印刷术传入说起。铅印在上海的墨海书局首创,其时尚未有电力作为动力,而还是用牛牵动印刷机器的,时期总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但已为创办期刊创造了条件。那些众多的杂志应运而生,时办时休,一直要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方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而渐告绝迹。我有幸在少年时于乡间藏书中看到大

批这类杂志,现在恐怕除了大的图书馆尚有存贮之外,见过的人不会太多了。那时物价便宜,杂志都是厚厚的,用四号铅字排印,执笔的撰稿人都是些洋场才子,以娱乐和消遣为宗旨,便是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的滥觞,当然谈不到有什么宗旨和影响,自生自灭,不值得一提。

辛亥革命后,方有较正规的期刊在北方出现,如梁启超主办的《庸言》和章士钊的《甲寅》,以及一些留洋绅士们办的《现代评论》,那当然远胜上述那些刊物,但还是很守旧落后,如《甲寅》是不屑刊载白话作品,也不肯接受西式的标点符号,并且寿命也都不长。

真正现代化的刊物是《新青年》和《语丝》,也都在北方编刊,两者是现代文学的摇篮,不但在中国期刊史占最重要的地位,即在培育新文学的业绩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因军阀的压迫及政府南迁,上海方成为期刊最集中的出版地,从20年代中期以迄40年代初,是期刊最繁荣发达的时期,各种刊物风起云涌,多得不可胜计。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达到顶峰的年份是1935—1936年,其中的一年被称为“杂志年”,盛况可以想见。《宇宙风》半月刊便是在1935年秋天创刊的。

《宇宙风》的创办人林语堂,是留学美、德的语言学者,回国后在北京教书,参加北方刊物的撰述,30年代初到了上海,适逢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他和一些朋友办起了《论语》半月刊,由邵洵美所有的时代图书公司发行,标榜提倡幽默和不谈政治,销路极好。其时国民党政府于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之后,对言路较为宽松,但不久即逆施白色恐怖。杨杏佛、史量才等民主人士相继被暗杀,林语堂也害怕受祸,乃退居第二线,由邹韬奋荐举在《生活》周刊任过编辑的陶亢德继任《论语》编辑。林语堂虽仍

审阅稿件,但两人性格观点并不一致,《论语》的格调为之一变。然初创时余势尚在,销路还是很好。不过它的印刷和发行都在人家手中,邵洵美是位公子哥儿,不问事务,听任下属,致《论语》时常脱期,发不出稿费,甚至编辑费都时时拖欠,使林语堂非常恼火。他又想提倡另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文体——小品文,由友人简又文的介绍,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人间世》半月刊,由林语堂任主编,陶亢德、徐訏任编辑,也是一纸风行,在当时众多杂志期刊中,销路亦占鳌头。但良友是广东人所办,与他们多有扞格,所以林语堂也很为不满。于是想到要自办一个杂志能畅满己意,独立门户,不依傍他人,这便是他创办《宇宙风》的原因,其时为1935年春夏之际。

林语堂和陶亢德都深受发行书店的苦,林语堂非常赏识曾受邹韬奋多时培训的陶亢德的办事能力,便与他商量合办《宇宙风》半月刊。陶亢德确是一位干才兼异才,他家庭出身清寒,不曾受学校教育,全靠自学成才,又肯刻苦用功,到后来竟能通晓五六国文字。而且他胸怀大志,要在出版界大展鸿图,要不是抗战发生致遭挫折,说不定会成为王云五或邹韬奋式的人物。

《宇宙风》不设主编,只书林、陶两人编辑,由林语堂出主意策划,陶亢德任发行人兼理一切事务,自己在愚园路愚谷村有了社址,并雇用六、七位办事员。当时杂志社人员都很少,邹韬奋办《生活》周刊,其鼎盛时期只有三个人,邹、陶之外,还有一位艾寒松,便是后来写《闲话皇帝》的“易水”。所以《宇宙风》社的规模比《生活》要大多了。

出版界的出版物无非是书和刊,两者相辅相成,或者由刊物而发展为书店,如生活书店和北新书店,或者由书店发展而创办刊物,如商务、中华之《东方杂志》和《新中华》。刊物定期出版,比较灵活,可以接受广告,也可为书店出书作广告,所以大书店

如商务、开明所出的刊物都有好几种。《宇宙风》社的目的,也要发展为大书店。

林语堂所办的杂志,都获得好销路,除了因为他自己的文笔和交游广阔外,还有他的一套办杂志的事务设施办法。其实那也不是林语堂自己发明,而是他在美国住久了,向美国出版界学来的。他认为杂志既名为期刊,这个“期”字很要紧,各种期刊适合各种不同内容的要求,例如周刊应是政治性的,年刊是资料性的,季刊是学术性的,而双月刊和月刊他都不喜欢,一般性的通俗文史杂志最适宜是半月刊,这在外国叫作 Fortnightly,每年出26期,比半月刊多了两期。所以林语堂所办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都是半月刊,只有他去国前最后参加的一本英文刊物《天下》则为月刊。“杂志年”出版的多种刊物,差不多一道同风达成共识,都是十六开的半月刊。如陈望道主编的《太白》,洪深、沈启予的《光明》,黎烈文的《中流》,曹聚仁、徐懋庸的《芒种》,都是由名作家撰稿的刊物,但销路均不及《宇宙风》,这原因便是他们只注重刊物的内容而忽视事务性的各种问题。

虽然号称“杂志年”,但刊物的销售量若和建国后的刊物相比,那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记得邹韬奋的《生活》周刊,曾在《申报》上刊登巨幅广告,请上海著名的徐永祚会计师审计,证明《生活》每期销量为十二万份之巨,在那时是中国的期刊第一名了;而美国的《生活》和《时代》以及《读者文摘》则为四百万份。

据会计师审计的资料,全国期刊的销量亚军为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八万份。接下来第三名便是《宇宙风》半月刊,也达四万五千份,《生活》是政治性刊物,《东方杂志》则以商务为后盾,资格最老,拥有如此销量。自不足奇,惟有新问世的《宇宙风》获得铜牌,确是来之不易。

上述《宇宙风》于文字内容外,还注重各种事务性问题,为其

他刊物所望尘莫及的,主要是决不脱期。《宇宙风》半月刊是每月一日和十六日出版的,但月之十二、三及二十七、八,在报摊上及作者、订户手中都已出现了,便是不但不脱期并且每期都是提前三五天出版的。拆穿了它的秘诀,毫不希奇,那便是编辑部内部掌握的出版日期,并不是月之一日与十六日,而是十日与二十六日,如此而已。

其次是当编辑的很辛苦,要一条龙工作,尤其是要跑印刷厂和排字工人交朋友,这点极为重要。旧社会称排字工人为“手民”,在工人队伍中位居首列,你和他们交朋友,他们也倾心给你工作,可以保证决不会脱期。其他如校对,《宇宙风》不设专职校对,当编辑的要躬自校对三次才可付印。拉长期订户,《宇宙风》鼎盛时期订户大约占销数百分之二十,使订户不但可以提早收阅而且免收邮费和享受折扣优待,实际上是刊物可以免去批发的七折折扣,取得经济效益。

最重要的对作者的稿费支付,这是其他刊物最忽略的环节:当时上海报刊最高的稿酬为千字三元,其下二元、一元、五角不等,甚至长期拖欠或分文不付。更恶劣的计算时还要扣除空白和标点符号。《宇宙风》的稿费明定为每页五元,每页的字数大致为一千字,这在报刊上是独一无二的了。并且对特殊的作者作特殊处理。如长期撰稿的郭沫若,时遭追捕亡命日本,生活艰难,所付他的稿费为每页十元,且长期先汇付二三百元存在郭处,每期结算,所以虽然郭沫若和《宇宙风》门庭各异,却直至他离日回国每期都为《宇宙风》撰稿不辍。而且回国的第一天,郁达夫从福建赶来上海迎接,也是在《宇宙风》社招待郭氏的。

很多报刊对作者稿费的支付好像并不打入成本,文章刊出之后,不知要多少时日才予支付,《宇宙风》每期付稿费的日子是根据清样开出的,比付印的日子还要早一些,作者当然高兴。

《宇宙风》的鼎盛时期是在创刊后的不到一年中,1936年夏季,林语堂忽然决定举家赴美定居,这对《宇宙风》的损失一时还不小,因为他在美还是时常“遥控”一切,并且还经常撰稿。他的去国,据一些传记甚至他的女儿所写,说是应赛珍珠之请前去写书的。但据我所知,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没当上南京政府的立法委员愤而出国的。当时林语堂还参加孙科所办的英文《天下》月刊的编辑,这个刊物由孙科主持的“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或“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罗致编辑多人,都是留学西方的知名学者,如温源宁、吴经熊、林语堂、桂中枢、全增嘏、姚克(那时叫姚莘农),以及后来加入的叶秋原。孙哲生是国民党政府的文治派,他以“太子”身份,虽没有地盘和军队,却不能不给以地位,所以当上长期的立法院院长。这个立法院在“训政时期”其实只是个法制局,并不能算是西方的议院,立法委员则多知名之士,连宋美龄都挂名在院里当委员,当然算不上是“代议士”;可地位很高,是和部次长的简任一级待遇,月俸银圆六百四十元,外加开会津贴,比大学教授几乎高出一倍。《天下》的几位编辑,如法学专家吴经熊本是立法院的骨干委员,温源宁是北大英语系主任教授,叶秋原也并不学法,都因《天下》接近孙哲生而当上立法委员。后来连学哲学的复旦大学(那时还是私立,规模不能和现在相比)教授全增嘏也当上了,只有林语堂也想当这个无所事事而坐领高俸的高官,却被挡了驾,原因是他曾参与过蔡元培、宋庆龄等发起的“民权保障大同盟”和编辑过《论语》,给国民党平添过不少麻烦。林语堂坐失月入千金而无所事事的工作机会,极为愤慨,因而一怒而举家去国了。

《宇宙风》不再如《论语》和《人间世》之标榜幽默及小品,而是强调散文。在政治方面,它确是不左不右的中间读物,因之可以左右逢源、两面不惹麻烦。它的最鼎盛时期,长期为之撰稿的

所谓“三堂鼎立”，名著一时。“三堂”者：知堂、鼎堂及语堂。鼎堂乃郭沫若的号，“四·一二”之后，郭沫若亡命日本，国民党政府严禁郭氏的著作，但对其所作考古及历史性著述则网开一面，予以宽容，不过不可用“郭沫若”的名字署名，无可奈何，经婉商才用了“鼎堂”这个别号。那时离开郭氏跟邓演达参与北伐已逾十年，已可算是历史了。所以他为《宇宙风》写的连载文章便名“北伐十年”或“北伐途次”，以当时人写当年事，真切动人，与知堂的冲淡平易之作，适成对比。郭氏虽身处逆境，但傲骨犹存，那批文章首次刊载，便闹起一阵纠纷，是为了争文章发表排列的次序。《宇宙风》把知堂的放在第一篇，郭文紧居其次，引起郭的又一次的不满。（第一次是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月刊上，也是和知堂争排列次序）郭氏说“我卖文不卖身”，势将不再供稿。林语堂在美来信说，“我们要买郭的文，并不买他的身”，后经郁达夫的调停，总算写稿如初。这件事我曾戏称为郭沫若的《争座位帖》（颜鲁公的名帖）。

“三堂”之外，在北平的五四健将，都是《宇宙风》的基本作者，尤其是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的老舍和在杭州定居的郁达夫，每期都有所作。老舍供给长篇小说连载，著名的《牛天赐传》和《骆驼祥子》，便是在《宇宙风》上首次发表的，郁达夫的大量游记也是如此。

《宇宙风》在那时还辟有专栏和特辑，两个专栏为《欧风美剧》和苏联通讯，都由在美、欧、苏留学的人撰写。特辑则有《自传之一章》、《我的爱读书》，以及曾朴逝世时的“曾孟朴先生逝世特辑”。尤其是《自传之一章》最令读者喜爱，后来还发展为整个自传，由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中所写的《实庵自传》及冯玉祥将军授意吴组湘执笔的《我的生活》，也是轰动一时之作，不过均因战起而不能终卷。

创刊不到两年,业务蒸蒸日上,但好景不常,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杂志界成立协会,组织只出一种刊物,好像便叫“抗战三日刊”,其他统统暂时停刊。到了十一月我军撤出,上海成为孤岛,一时看不准孤岛的命运如何,各业纷纷南迁,到香港图谋发展,《宇宙风》社便迁往桂林,还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此后人事磨擦,世事颠沛,《宇宙风》的黄金时代已告结束,但仍维持三四年的挣扎的逆境。

《宇宙风》以林、陶合作创办,到了林语堂赴美并不多时即走红,他便没工夫管国内的刊物了,他把合伙(权利)交给其三兄憾庐。憾庐是林氏五弟兄最忠厚老实而又非常清贫的一位,久居漳州,家累奇重,来沪依靠其弟佣书多年,为人极古怪,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同时又是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搞诗词之类,但不大会处理事务,整天泡在喝功夫茶及咖啡之中。这样的性格当然和陶亢德格格不入,双方隐忍良久,只好协议分家。《宇宙风》的牌子给了林氏,算是正牌,陶则另创《宇宙风乙刊》,算是副牌,各办各的。经济完全分开,名义上则仍是一家,不同的是正牌的《宇宙风》印上在桂林出版,《乙刊》则在孤岛上发行,实际上都在上海编辑印刷。正牌的刊风完全变了,《乙刊》却继承战前的风格和拥有过去的作者。这样到了1940年,上海的形势愈行险恶,而桂林社址却等于闲置,林憾庐便决定举家迁往桂林,正式在桂林编印。

林憾庐最志同道合的好友是巴金,在沪时年近不惑的巴金差不多每天来看他,在编辑部门前霞飞路上按巴黎人的习惯喝咖啡,也给《宇宙风》写些文章。林迁往桂林,巴金也去了,听说他和夫人萧珊便住在《宇宙风》社,并是在那里结婚的。林、巴两人在沪时还合办一个刊物,叫做《中国与世界》月刊,每期卖不出几本,全是退货,巴金写了不少没有稿酬的文章,署名为“师山”。

这段文坛掌故,知道的人现在几乎没有了。

上面说过,本书是一本选集,但我未参与“选政”,所以命我写前言,我无法评论其选文的内容或所选是否恰当,但有一点可以说明,即上文所述几位极负盛名的作家所选不多,这是因为选文有一个原则,凡是已收入作家本人专集的文章,一般不再入选。这样,“三堂”和老舍、郁达夫的颇多佳作,便因此而割爱了。又,限于篇幅,本书仅选《宇宙风》“正牌”的文章,对1939年在上海编印的《宇宙风乙刊》半月刊,却未予入选,上文说过,《乙刊》虽是“副牌”,却是能继承战前《宇宙风》的风格及得到过去大批作者的支持,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一共也出版了三年之久,所以若一并入选,使这个20世纪30年代极有影响的刊物保存其全貌,实为更有意义。

我这篇文字,名为这本选集的前言,但也可以称为我国期刊史上30年代的一些史料追记。由于事情已经过去逾一个甲子,有些事迹可能记忆失真,难免有遗漏失误之处,所存编辑过的《宇宙风》刊物,在浩劫中已成秦火劫灰,只凭记忆拉杂写成,请读者有以谅之。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三日



且说本刊

语 堂

“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此一代名臣曾国藩家书语也。夫以掌天下之权衡之中兴名将，不谈国事，不讲仁义，乃拳拳不忘于诸女做大鞋，弟辈养猪种竹，腐儒必讥其迂，今人必斥其不革命。但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人情事理，何止一端？孔子见朝燕居，本来不是一副面孔。忠臣思君固可，慈父教女做鞋亦无不可。今人抒论立言文章报国者滔滔皆是，独于眼前人生做鞋养猪诸事皆不敢谈，或不屑谈，或有谈之者，必置之为不革命，为避开现实，结果文调愈高，而文学离人生愈远，理论愈阔，眼前做人道理愈不懂。这是今日不新不旧不东不西不近人情的虚伪社会所发生的虚伪文学现象，而《宇宙风》之所以刊行于世。

文学不必革命，亦不必不革命，只求教我认识人生而已。孔子亵裘长，短右袂，与仁无与；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与义无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与礼无与；不得其酱不食，不撤姜食，与智无与。四者无与，而仍不失为孔子。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却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薰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措皆非，右袂不敢谈，寝衣亦不敢谈，姜酱更不敢谈，若有谈食精脍细者，必指为小市

民意里奥罗基而怒骂之。做人如此,只好退入蜗牛壳。这只是思想未成熟青年一斑之见,欲以一主义独霸天下,以一名词解决人生一切问题。殊不知人生不如此简单,可尽落你名词彀中,文学亦有不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故此文学观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不近人情的文学观”。其文不近情,其人亦不近情。人已不近人情,何以救国?

实则古人何尝如此,西洋人亦何尝如此?古人要人人安居乐业,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而后天下太平。西洋人要人人尽情工作,尽情作乐,皆所以得人情之正。现代人生观是诚实的,怀疑的,自由的,宽容的,自然主义的。现代中国人的人生观,承理学道统之遗毒,仍是虚伪的,武断的,残酷的,道学的,坐禅式的,真有朱子“一闻钟声便觉此心把握不住”之慨。然不有现代人生观,何以为现代人?况且宋朝理学将心把握得住之时,遂发现有缠足之风大盛及提倡贞女烈妇,禁止寡妇再嫁等不近人情的人生观。愈道学,去孔子之近情哲学愈远。

即以通行文体而论,也是不近人情。故也是非现代的。时行白话做势装腔甚于文言。“他是触到了难比的深度同阔度”是何鬼语?“而今日却被他们利用来掩盖同粉饰活生生的现实的雄姿的工具了”是何屁话?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辞藻为能事,以炫其宝,与做艰深古文者何别?故今日杂志虽多,而近情可读之文章极少。所谈既皆乏味,文体尤为艰涩。西洋杂志文已演出畅谈人生之通俗文体,中国若要知识普及,也非走此条路不可。杂志之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俗体裁贯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

《宇宙风》之刊行,以畅谈人生为主旨,以言必近情为戒约;幽默也好,小品也好,不拘定裁;议论则主通俗清新,记述则取夹叙夹议,希望办成一合于现代文化贴切人生的刊物。所以不专

谈幽默，正是以庆幽默之成功，无论何种写作，皆可有幽默成分夹入其中，如此使幽默更普遍化。所以不专谈救国，也不是我们不愿救国，只是不愿纸上谈兵。若有人相信此时之国尚系纸上空谈之所能救，不妨投稿他处谈谈，我们也很愿意看。此外也别无成见，惟有矫情君子理学馀孽，必诛无赦。我们暂以此刊与新旧道学作战。若有新旧八股先生戴方巾阔步高谈而来，必先以冷猪肉招而诱之，而后痛打之。

(第一期,1935年9月16日)



语 堂

吾不读书时即读书时，读书时即不读书时。著笔时即不著笔时，不著笔时即著笔时。不读书时读书，其书活；不著笔时著笔，其文化。

凡人练习文字，必先求得一本心所好读之书。心好其言，则并其文亦无意中得之。苟所言无味，硬着头皮去读，怒目相向而谓能习得其文采，必无是理。

何者为心所好读之书？书中句句的话打上心头，如有你胸中意见被作书人先说出，便是。此亦是缘分，拾句老话，先天注定也。

意思是主体，文采是面目。吾好某人敬某人，则声音笑貌无意中与之相似。今有心恶其人言谈之无味，而专学其声音笑貌之美者，结果必学不像，并俳优亦做不成。此时下教作文学作文之方法也。傻极，亦无谓极。

明末文学观念大解放，趋于趣味，趋于尖新，甚至趋于通俗俚浅，收民歌，评戏曲，传奇小说大昌，浩浩荡荡而来，此中国文学一大关头也。故十七世纪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放光明。而世人不察，明末清初文学史当从头做起也。

即并文学书画而合观之，十七世纪亦当列之第八世纪之后。

王维生于六九九，吴道子七〇〇，李白七〇一，颜真卿七〇八，杜甫七一二；又韩愈生于七六八，白居易七七二。柳宗元七七三。创作精神，勃然齐放。何以如此，我不说出来，说出来人家骂死我也。

袁子才七十九岁时作书与洪稚存云：“枚带眼镜已二十多年，须臾不离。今春在西湖桃庄，偶然去之，大觉清爽，因而试之灯下，亦颇了然。故特写蝇头，上污英盼。似此老童，倘到黔中应童子试，学台大人其肯赏一枝芹菜否？”（《小仓山房尺牋》卷六）此老天赋独厚，从此细处可看得出。盖子才少与胡稚威同荐博学鸿词，稚威初见即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胡稚威哀词》，《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四）想此老定有一番英灵气象驰骋于眉头眼梢间也。

耕读同一原理。文人作文，如农夫耘田，有一草便随手拔除，不待吉日；有一句话，一点真意思，便执笔书下。若摄影家然，看见好景便摄，防其相镜排好，天公不做好，不让你摄时也，尤防所摄人物挂朝珠穿朝服排八字脚时也。

不作文的人，不知读书趣味。时时写作，读书方得到好处。愈常写作，读书获益愈大。

看书须先看反面的书。吾向不看理学的书。近来将《小仓山房文集·尺牋》一气读完，看他口诛指戟，笑置理学之矫，痛快万分，而无意中却懂得理学立场。喜理学既不可能，惟有恨理学去读他。若不喜亦不恨，永远读不进去也。故恶意读书，亦读书之一法也。

吾前谓翻印袁中郎，“偷他版税，养我妻孥”，戏言之也。大杰标点《中郎全集》，我亦加入，书畅销。由是有人替大杰管账，算他版税可得千余元，实则到此半年我未拿到分文，大杰仅拿到百余元。然《中郎全集》已有五种翻印版本，总数在五万以上。